

解析符号学:诗性语言与母性功能

——试析克里斯特瓦的女性诗学

○ 王 慧

(天津商业大学 大学外语部,天津 300134)

[摘要]法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特瓦以颇具先锋色彩的解析符号学理论受到世界语言学界的高度关注。解析符号学起源于对传统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反叛,其理论内涵中蕴含的语言的异质性、动态性、多元性特征恰切地体现了她女性诗学的意识形态色彩。上述三个特征与女性诗学的两大思想支柱——诗性语言和母性功能的相互对应关系使解析符号学成为不是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为她最终成形的后现代主义的女性诗学理论夯实语言学及意识形态基础。

[关键词]解析符号学;诗性语言;母性功能;克里斯特瓦;女性诗学

朱莉娅·克里斯特瓦(1941—)是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她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解析符号学理论,突破了结构主义只研究静态的符号系统而非社会历史框架下动态语言的局限,标志着欧美文化界进入后结构主义时代。

解析符号学主要来源于巴赫金的对话诗学理论,又受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拉康的分裂主体理论的影响,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互文性”理论,它表现为不同符号系统之间转换生成的关系;二是意义生产动态理论,它关注文本的动态结构、转换机制以及意义生成过程;三是过程主体理论,探究意义生成之前和之中主体以何种方式存在的问题。新的符号模式转向社会文本,“互文性”让文本向更加宽阔的历史与社会这一他者开放,文本自然而然地与主体意识领域之外的无意识他者相连,“互文性”中的他者成为异质性的他者。

通过对语言异质性层面和心理分析的辩证式研究,克里斯特瓦突破传统的

作者简介:王慧,天津商业大学大学外语部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

语义逻辑结构，文本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实体，而是充满动态性和多元性的过程。她独具匠心的诗学符号学本体论将意义的符号学层面与母性身体功能及诗性语言联系起来，在交往的符号学层面运用母性身体，在语言意义的异质性层面运用诗性语言，而母性功能与诗性语言恰恰是她后来女性诗学的两大思想支柱，解析符号学也因为其蕴含的文本的异质性、动态性、多元性的理论特性成为她女性诗学的先声。

一、诗性语言：建构解析符号学语言体系的异质性层面

“互文性”概念属于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范畴，主要内容包括文本的异质性、社会性和互动性，其中，异质性最能突出“互文性”的本质特征。“互文性”把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都当作文本纳入文学研究视野，文本成为包含多种声音的意指过程，结构主义文本概念中的同一性、自足性就此被推翻。在克里斯特瓦看来，由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所催生的结构主义文论以抽象、静态的分析模式探讨“文学性”的问题，已经陷入了语言学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语言学依旧沉浸在其初始时的系统化氛围之中”。^[1]解析符号学将社会、文化、风俗等也作为符号体系来研究，文学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符号学实践。因为文本对语言学的符号语言进行再分配，符号学的出现也即宣告了语言学的解体，克里斯特瓦把这种文学文本的生产过程称为“意指实践”，用来指称符号体系的建立和抵消。其中，抵消符号体系是通过使言说主体经历烦乱的过程挑战已经获得普遍认同的社会结构的同一性，同时发生的就是社会中多次的断裂、复兴或者革命。^[2]文本的生成是意指实践的过程，是符号体系不断建立和抵消的过程，是言说主体的意识结构的刷新与重构，所以，符号系统成为一个动态的意指实践过程。

解析符号学关注说话主体的身份构成，强调文本的多层表意实践。她曾明确提出：“关于符号的这种解析理论旨在解构自斯多喀派以来以主体与符号为内容的符号学运作基础，重新确定符号学的方案。解析符号学——符义解析——绝不满足于笛卡尔式的或知性行为式的对封闭体的描述……它视表意实践为多元实践。”^[3]语言有生命力，文本的生产性通过对语言的破坏、重建来重新分配语言内部的关系。文本走出了单一封闭的分析模式，以语言为工具穿越文本之间的广阔空间，这打破意义单一性的局限，赋予文本以无限的意义。一个文本中可以同时读出另一个文本，具有对能指进行自由组合的无限潜力，即在符号的线性模式之下还潜藏着多维的阅读可能性。

言说主体通过文本所“说”的主体的异质性指语言还未楔入主体意识的符号态领域：“这种‘异质性’在婴儿第一次演说模仿中表现为节奏和语调……异质性指意分配不是意义分配或意指过程：没有记号、没有谓语判断，没有所指客体也就没有超验自我的操作意识。”^[4]此时的主体尚处在自我意识形成之前的圆满自足状态，没有语言功能和理性意识，处在本能冲动的支配之下，是一个未

成形的过程中的主体。克里斯特瓦的符号系统和言说主体理论提出的论断认为异质性就在主体之内,旨在发现意指实践过程中的言说主体,这个过程主体随时吸纳意指实践系统中不受制约的异质性的语言力量,以激发新的多元意指实践。解析符号学由于把语言看作是言说主体在本能冲动驱使下的话语行为,抓住了语言的异质性特征。她试图建构的来自于符号学领域并具有异质性特征的言说主体,是对理性、稳定性、连贯性和逻辑性的一种威胁。在这个意指实践过程中,音乐、舞蹈,尤其是诗性语言通过韵律和节奏等艺术形式表达出内在的冲动和欢愉,克里斯特瓦这样定义诗性语言:“一种语言,通过其抑制作用的特性伴随着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危机——盛衰、进化、革命或混乱的时刻。”^[5]诗性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和语义逻辑,是不能以标准语法进行分析的语言异质层面,解析符号学要挖掘的就是主体意识形成之前被压抑的内驱力的异质因素。诗性功能是一种分裂性的语言功能,它往往分裂意义或使其增衍,导向一种多元意义的冲动,展现为语言中的内驱力多元性,内驱力以其不懈的能量和异质性干扰意指功能。她还指出,诗性语言让我们接近这些本质为多元性的内驱力,其自身也有赖于这些多元内驱力的先已存在。

早在《诗歌语言革命》一书中,克里斯特瓦就主张内驱力的异质性与诗性语言意义的多元性之间有某种因果关系;内驱力在诗性语言的系统中冲破了语言惯常的、单义的框架,并展现多元的声音和意义不可抑制的异质性;诗性语言通过对单一意指的增加和破坏来演绎内驱力的异质性,在语言上表述为音与义的割裂或违反一个民族语言的文法规则。诗性语言孕育于子宫这一女性空间、是同母体密切相关的话语,它具有“易变性、多义性、否定性以及语义滑离、无逻辑等特征”,“否定形而上学的统一性,打破传统的语义逻辑结构,释放语言多义的无限潜能”。^[6]作为反抗父系律法的颠覆性语言,通过文本实践颠覆语言结构,释放异质性动力,其中的革命性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批判男权话语的有力武器,而文本也类似于颠覆等级秩序的语言的狂欢,由此可见,诗性语言中的符号体系的异质性层面孕育着克里斯特瓦后来走向女性主义诗学的理论萌芽。

二、母性功能:建构解析符号学交往体系的符号学层面

“互文性”理论作为克里斯特瓦解析符号学的初始概念,其动态性特征也影响了解析符号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过程主体理论。她的《诗歌语言革命》奠了解析符号学的理论基础:语言是一个流动性的意指实践过程,意义的产生是一个借助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链接而生成意义的过程。作为语言言说主体的我们,其主体性也因为意义的不断延宕而成为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变化过程。解析符号学吸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和拉康的分裂主体理论,克里斯特瓦在她的过程主体理论中建立两对密切相关的核心概念——“意识”和“无意识”、“符号”和“象征”。“前俄狄浦斯”是“无意识”和“符号”存在的场所,也是克里斯特瓦女性主体理论——女性诗学的生存活动空间。

19世纪末,弗洛伊德提出“无意识”概念,无意识隐藏于理性主体背后,扰乱主体正常的理性思索。无意识欲望的多样性瓦解了主体身份表面上的可靠性,而单纯的理性主体认识并不能把握人类复杂的主体性。为此,克里斯特瓦强调语言习得中主体身份的建构,提出两个重要概念“符号”和“象征”,替代拉康的“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区别。其实,解析符号学理论是“一种通过精神分析对语言学所作的反形式主义的重新阅读……它将对结构的关注转移到结构生成的过程,从对能指的关注转向符号。”^[7]“符号”描述语言形成之前,主体意识尚未分化的状态,类似于精神分析学中的无意识领域。因为没有认识的主体存在,起作用的只有无意识领域的冲动,以节奏、韵律为形式的冲动的表达发生在符号产生的“前语言”空间——“容器”(chora)。这个术语源自柏拉图,意指“一种有滋养性的母性容器”。克里斯特瓦重新界定这一概念为“子宫间”：“它是一种意指样态,在这种样态中,缺席的客体还没有出现,想象界和象征界还没有区分,因此语言符号还没有形成。”^[8]“子宫间”属于前恋母情结时期即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亲,是一种母性的空间,即符号活动和内驱力运作的空间,它处于逻各斯话语的断层,因而充满了律动与狂喜,也有暧昧与混乱。

与弗洛伊德的“本能”概念一样,“符号”构成了心理和肉体之间的关联。在克里斯特瓦看来,解构符号学不仅是关于符号和意义的研究,也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原始冲动、婴儿乃至胎儿在与母亲的深密接触中最早的力比多驱动(libidinal drive)相联。这种驱动力本质上是异质性的,作为矛盾力量的存在,破碎成许多点,然后凑成意义过程中的一种差异力量。因为驱动力的异质性,它们构成了对于标志着父权的象征秩序的永恒挑战,异质性应该是一种阴性、边缘性和革命性。克里斯特瓦重视符号的异质性,认为它在决定符号意义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符号也是“前语言”的混沌表达状态,这种“表达”不以语言为媒介;“我将符号称为梦里表现的原初场景。这一场景为生存与死亡的冲动所掌控,可能转瞬即逝,也可能编织进交流语言或者语法和逻辑建构的象征语言。”^[9]符号通过元音省略、重复、纯声音,以及借由意指不明确的隐喻有助于意义的增衍,其“最初的组织形式是节奏、语调和原初过程(置换、口误、压缩)”,^[10]这些展现在语言中的内驱力以不变的异质性干扰象征秩序的意指过程。符号与前俄狄浦斯的最初过程有关,作为一种记录潜意识内驱力的异质性语言,它使躯体和潜意识的节奏冲破传统社会意义的严密防线,表达不可言说的内容。象征秩序所压抑的并由符号态迂回显示的原初内驱力不仅属于母亲,也是幼儿的身体依赖于母亲的标记。在诗性语言里重新恢复的母性身体代表了一种浑然一体的关系,婴儿的牙牙学语和精神病症话语的呓语都是母婴浑然一体状态的展现——这是在婴儿与母亲分离之前的一个异质性的冲动领域,因此诗性语言意味着具有意指能力的主体的崩解,象征婴儿回到原初的浑然一体,也就是母性身体的状态。由是,克里斯特瓦为保持前主体的异质性,寻找到了诗性语言这一途径,通过这种与母体密切相关的符号意指模态使身体欲驱重返意识主

体并在其内爆发,成功阻止主体陷入父性象征法律和社会话语权力的支配。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女性从未被包含在生产关系中,其位置也不在国家中,而是在家庭中、在繁衍中。但是,母亲所代表的异质性始终伴随着个人自我意识和意指功能的发展,构成一种否定性的异质的意指模态——“符号”。虽然在自我的成形中,它被作为象征和自我的无意识,其异质性因素被移置了,但并未一去不复返,而是隐藏在象征建构的根基处,在精神错乱和现代诗文本中爆发,挑战男性主流文化的同质性。由此可知,克里斯特瓦运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回到自我意识构形之初的混沌,强调“卑贱”的母亲代表的自然和异质性及其在主体构形中的关键作用。并且,她个人妊娠的经验使其感悟到生育使自我的一部分变成他者,打破了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总之,克里斯特瓦以母性为基础的女性异质伦理学基于母性功能和诗性语言的存在得以确立,并发展成为她女性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理差异一直是平等和差异争论中的一个核心因素,波伏娃否认“永恒的女性特质”,不鼓励女性将男性特质视为标准。克里斯特瓦对男女差异提出保留意见,以积极的母性理论作为“女性特质”的标志——解构“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区分。在女性主义的后现代转向中,克里斯特瓦建构女性主义自己的文化遗产,正如她在《独自一个女人》一书中号召所有女人:“你们要一再地使自己不再成为过去的自己,你们务必要利用自身的奇特性,创造你及你们自身。”“女人应该也完全可以不被同类化,不被一致化;女人有充分的理由,也有比其他生命体更优越的条件,使自身成为随时变动和随时创新的自由生命。”^[1]这意味着所有创造性活动并不因为两性差异而有所不同,而应消除男女个体间的区别;它恢复的不是差异,而是作用于两性之间的双性倾向。克里斯特瓦的重点不再聚焦于“男女对立”的视野,而在于文化语境中的女性身份,特别是母性功能,为此她倡导一种基于个人独特性之上的多元女性主义理论,从文本、语言、潜意识中探讨女性受压抑的机制,运用有意识偷换概念等策略,否定西方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有力地批判男权一元话语。她对个性差异的推崇有鲜明的后现代特色,促进了女性诗学理论的多元发展。

弗洛伊德充满活力的无意识理论认为心灵的生活,尤其是幻想的生活揭示了主体必然要承受的欲望的多样性。拉康的语言精神分析学把研究的重心从镜像转移到言语活动,认为幼儿在象征界里获得主体性,是语言介入造成主体分裂。克里斯特瓦基于前两者发展出她的分裂主体理论,她认为,主体永在过程之中,进入象征秩序已然分裂了的主体,虽然已处于象征秩序之内,却又不不停地向前俄狄浦斯领域回归。既然这个过程主体是流动的,那么主体不能单纯地用象征语言解释。主体因其具有的过程性与“符号”相联,也就具有革命性意味。“符号”是象征语言中矛盾、分裂、沉默和缺失的东西,它组成语言异质的分裂层面,颠覆并超越代表父权秩序的象征语言符号系统。作为主体的女性始终游移在象征秩序的边缘,符号和女性身体都具有模糊的特质,难以清晰界定,符

号的边缘性、被压抑性及强大的反抗性有强烈的女性主义政治色彩。

克里斯特瓦还指出,主体进入象征领域,获得主体性是通过压抑母性身体来完成的,但它并未因此切断与母体的联系,那种联系经过移置与凝缩后被永远地留在前俄狄浦斯阶段之内,也埋藏于主体构形之中。克里斯特瓦通过把欲望驱动力引入主体构形,抵制象征对主体身体的“阉割”:主体陷在无意识、意识和符号、象征之间的冲突中,在同一性和分裂间摇摆。同理,母性身体因为隶属于前俄狄浦斯阶段而为父性阉割法则所不能容忍,但意识的征服只是压抑、无法根除主体认同母性身体:“从其主人——超我——那里产生的‘自我’驱逐(母性身体),但收效甚微。从其被流放的地方,(母性身体)一如既往地挑战自己的主人。”^[12]

克里斯特瓦的理论遵循身体、心理内部的多元逻辑,释放被文化压抑的母性因素,挑战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俄狄浦斯结构。基于此,克里斯特瓦支持“女性特质”的主体性概念:在女性特质(身体)和男性特质(语言、文化)的冲撞中产生了过程中的主体。过程中的主体总是符号与象征的双重体,意识与潜意识的双重体,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双重体,自然与文化的双重体。靠近潜意识的母性功能为父性文明所禁锢,又为父性文明的生成提供不竭之源。母性不仅是一种生物学本能,她的孕育空间是胎儿主体形成所需的符号运作空间,被母体卑贱化的主体才得以获得语言和文化的认同。作为不能以标准语法来进行分析的语言异质层面,诗性语言让语言重回母体子宫般原初状态,其中充盈着激情和神圣感。生命的存在变动不居,这种生命的自由植根于不断更新的重生,女性天生地把生命的降生当成自身对他人之爱的集中体现。所以,母子关系不仅是人类心理发展复杂过程的最初模式,也成为人类全部文化的原型。在父系律法体系内,时间象征从生到死不可逆的过程,但母性时间把生死诠释为以“与他者融合”为起点的重生,母亲因此将自身提升到新高度,自然而然地学会体验他人的真实处境。由此,克里斯特瓦赋予前俄狄浦斯领域的母性功能以特权,从而把“母性功能”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突出母性情感在探索人性基础方面的存在论意义。克里斯特瓦通过母性功能的论述诉说世界与人性的丰富多样性已远远超出父性文明体系的单一性,母性与父性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克里斯特瓦在解析符号学中明确地提出有一个在语言内颠覆父系律法的专属女性的场域,即前俄狄浦斯场域。拉康认为,语言符号系统发生在俄狄浦斯阶段,它体现文化的父权法则,女孩则以匮乏或否定的方式进入语言。克里斯特瓦反对拉康的理论,重建母权制价值观,提倡回到前俄狄浦斯的想象域,以抗拒象征秩序对女性的压抑,前俄狄浦斯状态因而成为一个理想化的母性隐喻,它意指一种女性诗学。在语言中建构的女性身体符号的主体,集沉默、分裂、反抗于一身,在前俄狄浦斯这个生存空间中自由嬉戏。由此可见,克里斯特瓦的女性诗学建立在前俄狄浦斯场域的主体对母性功能认同的基础之上,而母性功能又是以“符号”形式反抗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父权制的力量。

三、解析符号学：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女性诗学

克里斯特瓦的研究从解析符号学发展到精神分析学，再到母性理论，加之她的性别身份和岁月磨砺，经历了从中性立场过渡到女性主义立场的学术成长历程。特殊的东欧移民身份形成了她边缘人心理，她作为女性言说主体精心创制的诗学——符号学本体论，突出人文精神维度，既区别于结构主义无主体、无历史的凝固氛围，也避免解构主义以来学界所笼罩的相对主义焦虑症。她所提出的人本主义迥异于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逐步形成反西方白人历史中心论、男性中心论与逻各斯主义中心论的女性诗学的理论主张。

文本的动态性是“互文性”的前提，也构成解析符号学之意义生产动态理论的思想基础。“互文性”概念的提出使“新的符号模式转向了社会文本，文学文本是仅作为其中变量之一的社会实践。”^[13]于是，文本成为不断生产自身意义的动态研究对象。巴特还在《异邦之女》(1970)一文中赞颂克里斯特瓦充满异质性的符号学理论，她解析符号学理论中体现的异质性与其女性诗学的宗旨有内在关联。克里斯特瓦是从语言学和和心理分析两方面来建构文本的动态性特征的。

在语言学方面，她所研究的符号学既和语言学重叠又超出语言学的范畴，被命名为超语言学(trans - linguistics)。它强调话语的对话性，不是“在语言体系中研究语言，也不是在脱离开对话交际的‘篇章’中研究语言；它恰恰是在这种对话交际之中，亦即在语言的真实生命之中来研究语言。”^[14]语言不是僵死的，而是处于总在变化运动着的对话交际语境，是有生命力的语言。克里斯特瓦对符号的特点做了如下概括：“它不指涉单一独特的实体，但唤起一系列相关联的意象和概念。它趋向于脱离支撑它的那个超验基础，尽管它依然具有表达性。它蕴含着意义生产动态理论的转换原则（在它的领域中，各种结构无限地生成和转换）。”^[15]克里斯特瓦综合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相信并不存在一个超验的所指；在能指背后并没有所指。能指并不指向符号系统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在能指之间嬉戏。能指之间的交叉、组合和转换释放出无数的能指关系，而意义只产生于这些相互关系之中。新的文本是一种能动的话语形式和书写方式，具有生产和颠覆能力，因此其意义生产活动永不停歇。

克里斯特瓦由于深受同时代的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的影响，坚持认为“正是在语言之中，人类才将自我建构成为主体，因为在生命的现实中，只有语言才能确立‘自我’(ego)的概念。”^[16]她认为应把语言视为一个异质过程、一个离心过程、一种能指过程、一种独白体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结构体系，而是被言说的陈述主体，为各种意义所缠绕。由于异质性潜能不停地刷新自我和象征界的关系，主体是一个未定过程中的主体，文本也是这个主体的意识活动。由此，克里斯特瓦不像其它女性主义者那样在男女二元对立的框架内去寻求女性解放，而是从哲学高度去关注主体。作为过程主体的这个单一主体不是固定不变

的,也就拒绝了男尊女卑的固定性别身份,所以她的主体理论暗含了女性主义思想。

克里斯特瓦强调女性异质性,反对将女性看作同质的、普遍的东西,反对将“女性特质”等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女性特质”虽非本质的存在,但它仍是父权话语边缘化女性的一个手段。她试图把女性的意义从“本质的”转变为“关系的”,从本质的虚构性与女性的边缘性出发,寻求妇女解放的途径。她对女性异质性的强调,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建立男性与女性、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一种宽容、自由、和谐的关系。这恰是她女性诗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克里斯特瓦认为,语言是异质性的,意义生成是异质性的,子宫间也以异质性为其内在本质,它们共同创造“符号态”和“象征界”的辩证融合与矛盾运动,使得符号学体系成为一种动态的东西。因此,在心理分析方面,克里斯特瓦将理论触角引向主体意识建构的动态过程,即可分为“符号态”和“象征界”的意指过程。前者描述语言形成之前的主体意识尚未分化的状态,相当于精神分析意义上前意识领域的冲动;后者描述语言已经形成的状态,主体意识分裂并在其中得以确立,主客体分离形成对立。这一主体意识结构表现在语言结构系统中,意味着“象征态”充当了“符号态”的能指。在她看来,“诗性语言”既能容纳“符号态”的冲动能量而又不至于使主体陷入精神疾病。她的诗性语言理论突破传统的语义逻辑,摧毁二元对立原则,强调未完成性、变易性,因此在心理分析层面上它能够突破社会压制,将意指过程从语言结构表层扩展到深邃的前意识领域,展现了意指过程的无限流动,诗性语言活动是符号态与象征界之间的辩证意指流动。符号态(母亲)/象征界(父亲)的主体意识结构与能指/所指的语言系统之间的同构关系,将性别主体意识与语言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克里斯特瓦进一步指出,即使到了象征界,符号态也总利用语言的物质性层面入侵象征界。主体最终形成了象征界里被压制的无言的东西,贯穿于主体间的交流结构保证主体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主体并未因此切断与母体的联系,那种关系被移置并存在于无意识中,埋藏在主体构形中。同时,母体始终伴随着个人自我意识和意指功能的发展,构成否定性场所,破坏主体和意指意义的稳定性,失去了一致的、明确的身份,母性身份构成文化和自然、象征和符号、同一性及异质性之间的交叠。母性成为“符号界”与“象征态”的桥梁,母亲既可以进入象征秩序,也不须放弃自己的异质性。克里斯特瓦超越拉康的理论而发明的这种符号,足以满足母性完整的存在表达及其社会性,既不必屈从于父亲权威,也无须否定男性话语。这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女性诗学,能够调和女性的多重欲望,使母性变成一个真正有创造性的活动载体。

上述两方面在克里斯特瓦看来都是构成意指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诗性语言的意义流动赋予永久的动力,为主体意识保留更新的余地,为主体革命的出现提供基础,也为流动的母体以穿梭于主体间的形式来反抗父权秩序的象征界的压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对克里斯特瓦来说,诗性语言和母性功能所认可的文化让人们以一种非精神病的方式,经历母性领域特有的异质性经验。这异质性暴露象征秩序的压抑来源,挑战单一能指的统治,内驱力的异质性经由释放语言内部受压抑的多元性来驱逐父系律法单一霸权,克里斯特瓦因而强调,女人,以卓杰独创的精神和肉体,是不可取代的,是具唯一性、独自存在价值的生命体,也是不可抽象的生命单位。

解析符号学的哲学基础是欧洲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传统的一部分。人从属于他们的文化、历史、语言,只能作为主体而存在,主体性是语言的产物。克里斯特瓦由之发展而来的过程哲学反对自柏拉图以降的实在本体论,坚持主体性发生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之中,解析符号学也就成为更加活动化、更富有娱乐性、灵巧性的意指实践过程。主体性与语言学的结合使人的本能冲动和能量通过语言的运用表达并释放。“符号”与“象征”是区分意指过程的两种形式,却彼此缠绕,这展现她抛弃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倾向。她继承拉康的镜像阶段模式,发展了身份认同理论。无性别意识的婴儿在从符号态过渡到象征界的过程中,面对认同父亲或母亲的抉择,无论男婴、女婴都可以选择“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女性特质”成为选择或社会建构的结果,是文化而非自然书写了女性特质,身体也变成了文化建构。单一的主体变成一个处在过程中的有许多裂痕的主体,这一“多元逻辑”概念显示出父权权力被解体、重组,她对“女性特质”的论述彻底与本质主义的男性中心论划清界限。

女权主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过极端思想,认为母亲身份是导致女性受压迫的重要原因,这是传统的女性语言观关注语言和非语言交流中性别的相关点和差异性所导致的,它仍将女性置于受压抑的地位。在《女性的时间》一书中,克里斯特瓦倡导的多元性别理念更关注个体尊严的问题,并呼吁西方社会重新认识母性功能——女性主体性的最初来源是其独特的生理功能,母性是女性快乐的源泉,伴随女性生理上痛苦经验的是巨大的喜悦,例如新生命的诞生。要想改变母亲身份受压抑的社会文化体制,她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颠覆传统的语言和文化体系,排斥各种符号系统和理论论述系统的同质化过程,勇敢地走向使自身主体颠覆的女性诗学”。^[17]

四、结 语

解析符号学理论是克里斯特瓦“在符号学的大范围下提出的一种批评方法,强调语言的异质性和物质性层面以及文本的多层表意实践。”^[18]在她的理论体系中,“女性”一词已经延伸为“女性特质”,即一种母性。这种女性特质在语言学向度中体现为诗性语言,在心理分析向度中体现为母性功能;克里斯特瓦的女性诗学思想在语言学层面上体现为诗性语言对于象征语言的颠覆,在心理分析层面上体现为靠近潜意识的母性冲破父性文明体系的包围。概括地说,其女性主义批评的价值主要在于她认为女性受压迫更为隐蔽地潜伏在语言结构中

(语言构成了男性统治世界的工具),女性只有与父权文化的语言作斗争,才能颠覆父权秩序对女性的压迫。推崇女性特质是克里斯特瓦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色,女性的天性是把生命的出生当成对他人生命之爱的集中体现。由此,女性作为男性的他者存在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母亲角色因此对形成人类社会和文化也具有本体论意义,推进了世界的多元和谐。

总而言之,克里斯特瓦从意识形态和意指实践两方面来探讨符号学思想,把它置于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双重知识空间,认为它是一种颠覆父性传统秩序的政治批评实践。解析符号学内包含的文本的异质性、动态性、多元性特征为克里斯特瓦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女性诗学理论奠定了扎实的语言学与意识形态基础。

注释:

[1][2][5] Julia Kristeva,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trans. 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 Roudize, ed. Leon S. Roudiz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4, 18, 124 - 125.

[3] 史忠义:《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4][8] 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ans. 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7, 26.

[6] 罗婷:《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1页。

[7] Oliver Kelly. *Ethics, Politics and Difference in Julia Kristeva's Writing*. Routledge, 1993, p. 27.

[9] Ross Mitchell Guberman ed. *Julia Kristeva Interview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12.

[10] 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Raman Selden. *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A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8, p. 239.

[11] Julia Kristeva, *Seule, Une Femme. Preace de Marie - Christine Navarro*. Paris: Editions de L' Aube, 2007.

[12][15] Julia Kristeva, *Le Texte du Roman - approach Semiologique d'une Structur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nelle*, Mouton, 1970, pp. 12, 12.

[13] Moi Toril ed. *Semiotics: a Critical Science and/or a Critique of Science // The kristev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87.

[14]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问题》,见《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玲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

[16] Becker Leckronem. *Julia Kristeva and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23.

[17] 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89页。

[18] 罗婷:《克里斯特瓦的符号学理论探析》,《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第68页。

[责任编辑:黎虹]